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南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204, 1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10册

书号11111·164

定价1.80元

目 录

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	冯白驹(1)
海南人民早期的革命斗争·····	肖焕辉(47)
我从延安返海南时中央领导同志 和我谈话的要点·····	庄 田(70)
琼崖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要决策·····	马白山(73)
峥嵘的岁月(二)·····	罗文洪(81)
沟通南北联系 协同解放海南·····	王山平(145)
回忆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韩练成(151)
谈谈与韩练成谈判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史 丹(157)
全琼武装总暴动时间问题的考证·····	何敦锦 王克芹(160)
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汕头市委党史办公室(164)
保卫大埔交通站的斗争·····	曾昌明(174)
汕头交通站建站情况记忆·····	顾玉良(178)
十二年秘密电台通讯斗争的回忆·····	林 青(181)
延安的电波指方向 ——闽粤赣中心县委电台工作的回忆 ·····	胡冠中 刘旭 赖运如 饶德安(193)
广东党(团)活动纪要(上)·····	李志业 叶文益整理(208)
冯白驹生平活动年表·····	胡提春(246)

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

冯 白 驹

编者按 本文是冯白驹同志于“文革”期间在浙江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的，是他生前写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个材料，对研究琼崖党和人民革命斗争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里，作者处在被审查的情况下，所以对一些具体细节和时间、地点、人名等均无法进行调查核对；除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外，对我大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重要指挥人员也不敢提及，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发表这份材料时，冯白驹同志已经去世了，经征得他爱人曾惠予同志同意，正式发表，也是表示我们对冯白驹同志的亲切怀念。

省革委会提出审查我的问题，我表示欢迎！我相信，我的问题，党和群众是会做出正确结论，把问题弄清楚的。经过陈、徐二同志和我谈话，我已把我被捕入狱的经过情况向他们谈了，并写了一份材料送给他们了。不久后，他们又提出要了解我全面斗争过程的历史情况，要和我不断地谈完这个问题，而且也已经谈完了一部分，我提出是否让我写出来？他们说一面谈，一面同意我写。因此，我除了同他们面谈外，又写了这份材料，现送上，请审查。但是在面谈的材料中，由于没有什么时间仔细考虑，如果与这份材料有出入的地方，以这份材料做根据。

(一)

为了使全面地对我了解，先把我的家庭情况谈一下。我的老家是在海南岛琼山县云龙公社长太大队长太村。我的爷爷生下了六个儿子，我的父亲是第一个。他从没有进学校读过书，从小就跟祖父亲务农。结婚后生下了姐姐和我后，就被分家，自食其力。分家时分不到一亩地，分得一截房子，每年粮食自给还不够，要购买商品粮三个到五个月。幸亏我父亲长于打石手艺，连同他几个胞弟和村中一些兄弟，联合起来，挖石打石，挖得了一块较好的大石头。在打石中，各人工资由大家评议，在收入中剩余部分，按照各人工资高低来分。我父亲手艺好，当了师父，工资较高，从而有所收入，不仅缺粮可以购买，甚至还有点存积。后来买了几分地，造了一间屋子，还请一个长工(时间大约有二年)，并送我和弟弟进中学念书。我到南京、上海求学的一年中，由于挖得那块大石头的地方被大姓大村的连村借口伤害该村风水，硬行禁止，父亲失业，收入中断；且因我和弟弟进学负累，还向人家借了一些钱，欠了一笔债，因而我和弟弟就无法继续念书。这样看来，在当时我的家有点剥削的因素存在(仅仅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应划为富裕中农。我参加革命后，经过几个战争阶段，特别是在十年内战中，我家的屋子被地方反动派出卖了，原妻也被出卖改嫁了，父亲被抓坐过几次牢，在抗日战争中被反动派抓去肉刑受伤而后死了，弟弟也在一九三二年的斗争中牺牲了，我的母亲则流离失所，依靠姐姐和她的弟弟照顾过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则由地方组织照顾，密住在我们的革命村庄中。我的家在长期战争过程中，已全部破产，而且整个村庄都被烧光、掠光、杀光(当然有些人逃脱)。到海南解放后，我有三个孩子，夫妻二人，连同母亲一共六口人。在土改时，我的家被评为贫

农，还分得不少土地。同时，在我个人来说，既没有什么不好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

海南岛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从一九二五年冬、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调琼，消灭了统治海南岛的小军阀邓本殷而开始的。

我是一九二六年初开始参加革命斗争的，和全岛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直到一九五〇年五月，配合主力部队渡海作战，解放海南。

海南岛是祖国在南方孤悬海外的一个孤岛，是祖国的组成部分。海南岛人民革命战争，也是祖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组成部分。在祖国人民革命战争来看，是极其渺小的，是沧海一粟。在祖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有力推动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海南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努力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海南人民革命战争虽处在孤岛上，经过说不尽的困难和曲折，但实际上是遵循着毛主席所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个规律，跟着全国的解放，并由主力部队渡海作战，推翻了在海南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最后胜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胜利，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二六年以前，我在学校念书，经过高小毕业、中学毕业，一九二五年到南京东南大学投考，没被录取，在校补习了半年，后到上海进入大厦大学预科，念书半年。一九二五年底，一方面是当时学生和工人反帝（五卅惨案）运动，受了革命影响；另方面是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接济求学，只好退学回家。一九二六年初，到海口找在高小念书时的同学李爱春同志（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是国共合作时任琼山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要求他给我介绍工作。因为我们在高小读书时是较好的同学，有求必应，他介绍我到海口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当主任。我到这个岗位上去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海南是四

月二十一日），共有一年多一点时间，就结束这一工作，转入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一年多一点时间的郊区农运工作过程中，我经常深入农民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农会工作，把郊区各乡的农民协会统统组织起来，成立了各乡的农民协会，有些乡还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如仲恺乡等）；同时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等斗争。曾在五村乡领导过农民反对恶霸地主吴为藩霸占农民大块土地的斗争，几千农民群众奔向当时国民党琼山县政府请愿、静坐和游行示威，要求收回土地。结果达到目的，取得胜利。我当时刚离开学校，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任何事情就参加革命，搞农民运动，和农民群众一起，进行各种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这对我来说，不仅受到很大的教育，而且向农民群众学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增强了阶级感情，锻炼了自己。

我在这段时间的工作过程中，也由于李爱春同志的介绍，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光荣地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员，这是我的新生，永远不能忘记的光荣的一件大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我从乡下回到海口。吃过中午饭后，就到客厅翻看报纸，看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军警在广州抓共产党人，心中有点奇怪，就走出办事处到外边了解了解情况，刚走出办事处几十步，回头一看，军警已把办事处包围了。我急了起来，就加快脚步，跑到郊区某乡农民协会去了。大约在农民家住了几天，打听了一些消息，得到的消息是：海口天天在抓共产党人和革命学生。于是，我就和农民同志商量，带了三、四个农民同志，化装祭坟（当时正是清明时节，海南习惯在这个时候祭坟）^①，回到我的老家。我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有同志告诉我：王文明同志（他当时是海南地委书记，公开职务是国民党

^①据查对，清明节是四月六日，因此，冯、王离开海口到琼山农村相遇是四月底或五月初。

第十二师的党代表）也从海口逃出，住在距我家几华里的本里湖村，他是要回到他老家乐会县去的。我知道了，就去见他。他也听到同志告诉他，说我也回到家了，也想找我一谈。彼此相见之下，喜出望外。他对我说：事变是革命斗争的必然规律，没有什么奇怪，斗争是要继续下去的，革命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工作，领导群众斗争，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等等（大意如此）。同时，他提出组织琼山县委，指定陈秋辅、冯裕江和我三人组成县委，指定我为县委书记，并说他明天就要回乐会去了，希望我努力工作，还要加强联络。我也随即告别，祝他途中慎重，安全到达目的地。

我记得很清楚，为了完成王文明同志和地委交给我的任务，我于旧历五月初五（新历六月四日）端午节那天，就离开家庭到十六区（甲子的地方）去找认识的同志，通过和同志讨论，成立区委组织；又到十七区（树德地方）找同志成立区委组织；再到十二区（三江地方）找陈秋辅、冯裕江两同志，传达王文明同志的意见，成立县委。在成立县委的会议上，我们研究和进行的工作要点是：一，加快建立各区委的组织，发展和建立基层党的支部组织，做好发动和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核心；二，组织短枪队（即驳壳枪队）二十多人，进行红色恐怖，寻机打杀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官吏、恶霸地主等民愤极大的坏人，以便推动革命斗争；三，调查和掌握乡村中人民所有的枪枝，编组武装队伍。开始组织一个中队武装，人数约有百人左右，不久，奉命调到特委住地乐会那里去。我们随就另组一个大队武装组织，约二百多人；四，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各种工作的干部骨干等等。

经过多方面做工作，特别是经过红色恐怖工作的有力推动和大规模组织发动群众配合，武装力量向国民党乡公所展开猛烈攻势以后，琼山县的群众革命风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农会、

妇女会、少年先锋队 and 童子团等群众组织，都先后建立起来。清算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等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到处风起云涌，抓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游乡、游街，推倒菩萨，破除迷信等等，都在农村中闹得天翻地覆。作为公开政权的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也在相继建立。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也由我来负责。全县共有十七个区。党组织的区委，除附近海口地区有五、六个区没有建立区委外，其他各区都建立了区委；基层支部也有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们琼山县的武装组织，已发展到几百人，有两个大队。当时特委指定我们是中路指挥部第七路军，我是该路军的党代表。我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斗争中，我的用名是冯继周，现名冯白驹是一九二八年革命低潮后改用的。

当时，海南的武装组织名称，开始是人民革命军，不久，又改为工农红军。全琼崖有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冯平（在革命低潮时被捕壮烈牺牲）是工农红军总司令员，党代表是杨善集（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总指挥部辖下有中、东、西三路指挥部，每路指挥部管几个县，每县是一路军，我们琼山县是中路指挥部第七路军。当时全琼武装力量，据我所知，大约有七、八千人左右。

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琼崖特别委员会设在乐会县，指挥和领导全琼崖的革命斗争。全岛各县（当然不是全部）的革命斗争，也同琼山一样闹得满城风云。乐会、万宁等县的革命斗争更加深入和发展，并在一九二八年建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乐会、万宁县以及某些区乡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革命的途程总是要经过曲折的。约在一九二八年夏季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军蔡廷锴部队调

琼。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向文昌开刀。文昌的革命斗争被压服后，文昌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向琼山撤退，蔡部反动军就跟着向琼山进攻。经过几次的剧烈战斗后，在琼山东边，我们也支持不住了，我们琼山和文昌的武装力量，以及一些干部，就向琼山西边永怀山撤退，但敌军也跟着把我们在琼山西边的永怀山包围起来。经过几天战斗，我们认为在这个山里坚持和敌军硬打，是不合算的，是会遭到更大损失的，因此，便决定突围，武装力量向乐会特委住地撤退，干部仍回地方坚持工作。但在我们县委中，陈秋辅、冯裕江两人和我的意见不同，他俩主张跟武装力量向乐会撤退，我反对他俩的意见。我仍在琼山坚持工作恢复琼山东边的一切组织，并向琼山西边新的地区发展，在海口府城附近的乡村发展我们的组织，并在下洋山区争取了一帮小土匪，不仅使他们停止向群众打劫，且变为掩护我们工作和进行打杀反动派，给我们恢复和发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秋辅和冯裕江跟武装撤到特委住地后，被特委批评了，也回到琼山来了。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夏，省委派黄学增同志来任特委书记。他来的时候，正是海南革命斗争处在严重的关头。他来了，领导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经过发动秋收暴动（即秋季攻势）和反攻陵水等的战斗失败后，到一九二八年底，全面斗争已走向低潮，武装力量仅存一百多人，因此，王文明同志和一批干部，带同一百多人的武装力量向母瑞山地撤退。黄学增同志和特委一些常委同志及青年团特委一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初迁到琼山县住起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琼山县委帮助他们机关进驻海口和府城，实现他们提出城市领导革命的要求。黄学增同志对我说过，大意是：现在革命失败了，今后要发展城市工作，开展工人运动来领导革命，因而特委机关要迁驻海口和府城（琼山县城），要我们替他们租房子，选派女同志配合干部住家，和搞职业化来进行工作。

他们这个提法是和毛主席提出的创造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建立农村红色政权、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斗争航向相违背的。当时我虽有感觉，但还认识不够，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琼山县委帮助特委迁驻海口和府城后，黄学增同志提出：澄迈工作自革命低潮后，工作恢复很困难，决定把我调往澄迈县任县委书记；琼山县委书记由陈秋辅同志来负责。我在琼山工作两年多至此就告结束，到澄迈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我到澄迈新的工作岗位后，经过一段时间，配合原在澄迈县的一些干部，逐步地把澄迈工作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恢复起来。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夏或秋初的时间（具体时间记不清），因为内部有人叛变，特委在海口和府城的机关被破获，干部统统被捕。当时黄学增同志到香港汇报和请示工作不在，但当他回到海口时，找不到机关和干部。他不是本地人，又不熟悉农村，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借病进驻海口美国人办的福音医院，但一进医院，当晚即被捕，后来壮烈牺牲。这事由澄迈县委布置在海口和特委联系的同志（做小贩的）回来向县委报告。我们得悉之下，悲痛万分，除悼念牺牲的同志外，经过县委研究，用县委名义向各县委报道这事，并提议召开各县委联席会议，交换情况，研究工作，和产生新的特委来统一领导海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提议得到各县的同意，便在当年的九月底在定安县内洞山地区召开各县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单位代表有：琼苏党团代表王文明（他当时是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琼东县委代表符明经，琼山县委代表张志军（他当时是琼山县委书记，陈秋辅同志已牺牲），定安县委代表王志超，澄迈县委代表冯白驹，红军代表冯国卿等。会议除了交换情况，研究积极准备力量，迎接新的斗争外，产生了新的特委，由十一位同志组成，五个常委，并由王文明同志提议，选定我为特委书记，各到会代表一致表示同意，后报省委批准。

至此，我在澄迈工作仅有半年多一点时间，就到特委工作来了。

我到特委工作不久，就在一九三〇年初，接省委通知，要我到省参加广东党第一次（是否第一次记不清）代表大会。那时正值旧历年关，我乘着旧历年关人家都过快乐年的时候，便从定安带同一位交通员阿发同志，用自己同志的民船到海口去，住在平民客栈，等候火轮船到香港去。有位在客栈服务的人员，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他来向我提议，说你俩这样整天住在房子内，既不出外，又不干什么，会引起人家怀疑，他说他想找他另一位朋友，连你们二人，一共四人一起打“天九”（骨牌）玩玩度过时间，这样来表面应付一下。我认为他这样提议，是个好意，我俩表示同意，就这样度过三天。初四（新历二月二日）那天，我俩就乘坐火轮船到香港来了。到香港后，省委安排住宿。过了几天，我便到上海去，同我一起去的有几位同志（没有认识的同志），交通同志则回海南。到上海后，住在一幢几层楼的最顶一层，睡吃都在那里，开会也在那里，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和讨论立三路线。会议中提出几条纪律，听到警铃声响，一，做好准备；二，撕碎文件；三，吞掉文件；四，各自逃跑。在这次会议上，我开始认识了李立三和周恩来同志，因为他俩来给会议做报告。会议大约开了半个多月，我便回香港，住了几天，接受省委工作指示后，便回海南。当时省委书记是谁？是否是陈延年，我现在记不清了^①。在从香港回到海南途中，我是坐轮船到海口的，大约晚上八、九点上岸，上岸后，我仍到平民客栈住。我一进客栈，就有一位大约十五、六岁的小童急着问我，你是否要住客栈？我说是，要住客栈。他说跟我来。他带我到三楼后边的一个小房子，开了门，叫我住在那里，还说你住在内面，我把门锁着，你不要怕，要吃饭，我到外边替你买饭来吃，明天你要回到哪里，

^①省委书记是罗登贤。

我替你买好车票，叫车到客栈门口来让你上车，等等。这样，我就感到他是一个好小孩，我除了感谢他外，一一照他的安排去做了（后来我问这位小孩，才知道他是海口郊区某乡农会的人，我在海口郊区做农运时，他认识我）。第二天早上，车到客栈门口时，他来带我上车。车开到定安县城附近的地方，我便下车回农村（因为那里农村我活动过，我认识），再到特委去。

我回到特委之后，将在上海参加会议的情况向特委传达。根据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结合当时海南的斗争情况，讨论了如何开展和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到来。于是决定召开海南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的召开，时间是在四月初旬。省委派邓发同志来参加和指导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母瑞山。会议的内容，有邓发同志代表省委作关于当前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我作关于上海会议精神的传达；符明经同志作关于特委工作总结的报告。在讨论中，我能记得起的，主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如何开展红五月的攻势斗争；二，如何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三，如何发展和集中武装，成立独立师；四，如何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组织兵变和兵暴；五，如何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各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进而进行土地改革；六，选举新的特委。选举新的特委委员十三人，常委五人，我仍被选为特委书记，后报省委批准。

会议大约开了二个星期左右。会议结束后，经过全党的努力，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会议的精神和决定，特别是通过开展红五月的工作活动，向敌人展开攻势行动，使驻长坡及陵水国民党保安队二个连队兵变，打开了海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继而红军独立师成立，更有力地把斗争推向前进，掀起全岛革命斗争的高潮。

这次斗争高潮是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年海南人民革命斗争高潮

的继续。在这次斗争高潮中，不仅完全恢复了一九二七到二八年斗争高潮中的工作地区，而且发展了新的地区。计当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有：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琼山、陵水、崖县、文昌等县。虽然这些县份并不是全部受我们控制，但我们所控制的地区也并不少，有些县份多些，有些县份少些。在我们公开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记得当时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人口大约一百万左右。在苏区内，乡有武装赤卫队组织，县有武装基干队组织，每县都有几十人到一百多人，还有少年先锋队、劳动儿童团、妇女协会的组织。在苏区内，也实行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子和浮财进行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地少农民；对中农是采取团结政策；对富农是采取中立政策。富农的划分，是在他们总收入中，剥削部分占主要的则划为富农（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同，在总收入中，剥削部分超过百分之十五、二十、或二十五也划为富农，这是我的回忆，不一定准确）。琼崖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二八年在乐会已经成立，主席是王文明同志。一九三〇年底，王文明同志病故，继任主席是符明经同志。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成立红军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一个警卫营，一连娘子军，和每团有一个短枪（驳壳枪）连，营也有短枪排，连有短枪班。在编制上是按照三三制，每排三班，每班十二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每团三营。师部还有政治系统、参谋系统、副官系统、文字系统和随军训练班等的组织。师、团有政治委员，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还有党的一套系统组织，师、团有党委会，营有总支，连有支部，排或班有小组。还有政工队、文工团等组织。全师人员共约六七千人。

关于娘子军的问题，我们所以编组娘子军，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为着表扬和发动海南妇女的革命斗争。我们认为海南

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是很好的，一九二七到二八年的革命高潮，不少妇女同志和群众参加暴动，英勇地向敌人冲锋，不怕牺牲；革命低潮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是那么异常厉害，但还坚持工作，敢于和我们工作同志联系、接洽和掩护工作同志。有些比男同志还好，丈夫反动的带领我们打死他，甚至丈夫反动的，在夜间和丈夫睡觉时，自己用刀子杀死丈夫，逃出参加革命。红色娘子军电影中的琼花，只是这样英勇斗争的女同志中的一个。在部队中，卫生员、炊事员均是女同志，工作不怕艰苦，部队行动时要挑重担子，部队宿营休息，她们要挑水、捡柴、做饭，坚持工作，不怕辛苦。卫生员不仅要照顾伤病同志，到处采草药，且在作战时，也跟武装同志上火线，抢救带花同志。在各机关，在后方工作的女同志，对工作很负责，积极肯干。同时，她们纷纷提出要求，参加武装，拿枪杀敌。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为了发扬妇女同志的英勇革命精神，鼓励妇女同志更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同时适应她们热烈参加武装、拿枪杀敌的要求，我们便决定组织娘子军。时间是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①。当时成立了一个连，人数约一百二十人，全连除了师部派一个教练员是男同志外，全连均是女同志。这些人都是部队和各县发动和选送来的，连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党支书。娘子军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在特委和师部住地外围红白交界地区活动，保卫苏区，打击国民党区乡公所常来抢掠和扰乱苏区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和鼓励那些反动武装力量来扰乱苏区和抢掠苏区人民财物、杀人、放火，提出了“打到苏区去抓娘子军回来做老婆”等口号。但这些豆腐军每一次来扰乱和抢掠苏区，都被娘子军打得落花流水，惊惶逃命，且有被打死和被俘缴枪的。娘子军活动苏区，和群众结合很好，经常参加农民生产，帮助农民干各种农

^①经核对，娘子军特务连成立时间为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

活，很得农民群众拥护。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娘子军还占了第一位。在一九三一年冬季，国民党反动军陈汉光部大举向我们进攻，特委、师部等领导机关和主力向母瑞山撤退，娘子军和部分红军仍留在原苏区活动，进行游击战，以牵制敌人。后因敌人压力大，娘子军被包围在牛庵山，同敌人周旋和激战二天，结果无法突围，被歼灭过半，逃跑一些，被俘一些，指导员牺牲，连长被俘，至此娘子军便告解体。据说连长被俘后，被敌欺骗，讲些不利于革命的话，后被释放，到农村嫁给人家；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就地参加斗争。

在海南来说，一九三〇年到三一年的革命斗争，比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年的革命斗争更加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不但是红白对立厉害，革命的武装与反革命的武装战斗剧烈和频繁，革命与反革命处于斗争的决战时刻，而且敌人对破坏革命、破坏苏区的活动是多样的，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来破坏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在我们的苏区内，在我们的各种组织内，当时发现有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的组织和活动。他们的政治阴谋，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配合国民党武装进攻，达到破坏革命、破坏苏区、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以及达到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目的。它们的活动方式各种各样的，花招是很多的，又隐蔽、又公开，有时是从右的方面来，有时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在宣传上主要是散布共产党现在不行了，从上到下都通通改为社会民主党了。特别是在下层支部中，散布这些反动论调，来动摇我们的同志，瓦解我们党的组织，并且到处造谣，假捏事实，无中生有，说什么党团关系不好，党对团不照顾，不帮助解决困难，挑拨党团关系等等。在组织上，特别在下层支部组织中，进行收买利诱我们的同志，对象是一些动摇分子，或成份不好分子，或对